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6.05.002

记忆、认同与主体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与巩固路径

赵 月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代语境中,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和巩固成为摆脱现代性困境、回应"我们是谁"之问的重要命题,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内在要求。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根植于集体记忆的持续储存、唤醒与认同转化:辉煌记忆依托物质、精神与制度文明确证文化自信的历史连续性;创伤记忆在民族危机与文明碰撞中激发文化自觉,推动文化主体由防御性觉醒走向主动性建构;交往记忆则通过代际互动和社会实践实现文化记忆的动态传递,为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提供文化韧性。在集体记忆的意义建构基础上,个体和群体进一步完成由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到政治认同的转化,形成由文化归属、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政治认同共同支撑的身份认同结构,进而实现从历史记忆到文化自觉、从身份确认到主体建构的内在转变。进入新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筑牢集体记忆的政治根基;梳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激活中华文化记忆基因;构建中华文明叙事体系,贯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文明脉络。通过推动集体记忆的创造性转化和认同结构的持续生成,实现中华文化由传统赓续向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跃升,为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深层支撑。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文化主体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第二个结合"

当代社会,全球化与现代化深入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文化主体性问题由此成为理解民族文化发展、文明传承与现代转型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30 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在推动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等的价值理念和存在状态"[2],其深层意涵在于确立文化主体对自身文明传统、价值体系及发展道路的自主认知,并在与"他者"的交往互动中不断回答"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问题。作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范畴,文化主体性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出场,折射出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体认已达到相当自觉与自信的程度,围绕文化主体性所开展的一系列学理探讨更标志着中华民族当代"文化自我"的成熟[3]。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和巩固,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实践之中,其中的集体记忆构成理解其生成逻辑的重要切入点。作为承载民族共同历史经验与文化意义的精神载体,集体记忆并非对既往历史的

引用本文:赵月.记忆、认同与主体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与巩固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5):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209);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2023MYB012)

作者简介:赵月(1998—),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哲学研究。E-mail:zhaoyue_17@163.com

机械保存,而是在持续的储存、唤醒、阐释与传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进而为凝聚民族情感、维系共同体意识提供意义纽带。更为重要的是,集体记忆只有通过主体的主动保存、解释和实践,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文化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对共同历史的记忆、理解与再阐释不断推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相互贯通,使个体和群体在确认“我是谁”的同时进一步形成“我们是谁”的共同体意识,由此推动文化自觉从历史记忆中生成,并不断转化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形态。

一、记忆储存:集体记忆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历史根基

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的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向前。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4]35 换言之,集体记忆本身携带历史印记,但并非对历史的简单复刻,而是通过对历史情境的超越和历史叙事的反思,实现某一族群历史文化的连续传承,并在现实语境中完成意义重释。基于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体现为世界历史视角下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扬弃,即以“文化自觉”[5]为内核,对自身文化记忆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在发掘固有精神资源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难发现,“集体记忆具有连续性和可再识别性的特征”[6],这一特性恰恰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延续奠定记忆基础。

既有研究已从不同维度对集体记忆进行了类型划分,如吴玉军将记忆分为辉煌记忆和悲壮记忆,认为“两种记忆都包含着崇高感”[7],这种崇高感对国家认同具有关键价值;赵静蓉聚焦全球化语境,主张区分记忆的创伤性和启蒙性,认为集体记忆中“一种是启蒙记忆,一种是创伤记忆”[8],分别承担思想觉醒和苦难警示的作用;扬·阿斯曼则将集体记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4]44。现有研究为理解集体记忆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应进一步围绕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的核心议题,即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既需正向的文明自信支撑、危机中的觉醒动力,也需代际延续的动态韧性。基于此,集体记忆可被提炼为辉煌记忆、创伤记忆和交往记忆:辉煌记忆依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符号系统确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文化主体性提供正向价值支撑;创伤记忆警示危机,特指近代救亡图存语境中的苦难叙事,通过激发文化主体性的防御性觉醒推动其从被动抵抗转向主动建构;交往记忆能够避免阿斯曼文化记忆范畴的宽泛性,聚焦社群中的记忆传递实践,在代际互动中维系文化韧性、实现动态传承,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保障。

1. 辉煌记忆:文明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价值确证

辉煌记忆作为文明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价值确证,根植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未曾中断的历史积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话语表述、语言文字、文化遗产、文学艺术、杰出人物等具有影响力、感召力、感知度的各类载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主要来源。”[9]中华文化通过物质、精神与制度三重维度的符号系统构建了独特的文明认同根基,而辉煌记忆的当代价值正体现在对这一认同根基的创造性激活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1]252,这一论述要求以历史自觉激活文明基因,在精神标识的提炼中重构“何以中国”的价值坐标。

第一,物质文明是文化主体性最直观的载体,以实体形态承载着辉煌记忆,能够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具体而言,长城、敦煌石窟等物质遗产展现着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工程技术和审美水平,以可感、可见的物质形态记录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和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文明并不是单纯的物质技术成果,其背后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知识体系、实践智慧、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怎样认识世界、怎样处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最终会沉淀为一定的物质文明成果。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是大陆文明。”[10]这一判断表明,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深厚的文明根基。正是在长期的文明实践

中，中华民族不断将文化智慧转化为具体的物质创造，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重大科技成果既体现了古代中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的实践能力，也成为中华文明长期延续和自主创造的重要见证。由此可见，物质文明不仅保存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且以具体的文明成果彰显着中华民族持续创造和发展的主体能力，为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

第二，精神文明是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标识，承载着辉煌记忆的价值内核和思想体系，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理解和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从《礼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典籍中沉淀的不仅是道德准则，更是一套将个体生命与文明命运紧密联系的意义机制。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塑造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更影响着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气质。从家庭层面的孝悌伦理到国家层面的为政以德理念，传统价值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秩序和治理理念，成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标识。进言之，个体价值实现不局限于私人领域，而是与文明的存续相连接，其中所反映的家国一体价值取向正是辉煌记忆在精神层面的核心内涵。

第三，制度文明是文化主体性的组织形态，通过历史经验的积淀和总结，能够为中华文明在复杂变迁中保持稳定性提供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德治理念、天下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政治制度、治理机制等形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化表达。从周代礼乐制度所形成的秩序规范，到唐宋不断成熟的官僚治理体系，再到明清中央集权体制，中华传统制度文明在不断的调整和演进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而这一传统制度模式的关键特质在于将伦理和制度相融合，其制度设计坚持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以礼规范等级秩序、以乐调和社会关系。从更宏观的视角而言，中华传统制度文明的演进恰恰印证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韧性，能够在时代变革中实现自我更新，尤其是进入新时代，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对传统国家治理的创造性激活，展现出中华文化主体性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与制度自信。

2. 创伤记忆：民族精神和文化主体性的危机觉醒

创伤记忆作为民族精神与文化主体性觉醒的“催化剂”，其本质是在苦难叙事中实现文化主体性的防御性、建构性觉醒。从概念内涵来看，“创伤记忆是人类在经历突发性、灾难性事件时，由于事件本身的残酷性超出个人的承受能力，从而导致创伤主体在生理，尤其是心理上的创伤。”[11]这一记忆承载着民族生存的创痛印记，激发着文化主体在与文化“他者”的碰撞中以自主性、自觉性体认自身文化生命。而这种文化生命的内涵，需从生命的双重维度深化理解：“生命可分为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自然生命作为血肉之躯，是基础，而文化生命作为精神结构，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的重要特征。”[12]这意味着，创伤记忆所触动的并非仅为自然生命层面的回忆，更是指向文化生命层面的存续焦虑。值得注意的是，对创伤记忆的回忆不应理解为单纯复述仇恨，而应通过反思历史、尊重历史并汲取经验，避免灾难的重演，进而将创伤记忆转化为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若仅固守过去创伤的历史回忆，而未能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文化力量，反而易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导致文化停滞。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脉络中，创伤记忆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创伤记忆以刺激性和警示性促使文化主体审视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进而推动民族精神的重建和文化主体性的防御性觉醒。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拖入世界历史体系，西方列强的舰炮轰开的不仅是地理疆界，更撕裂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天朝上国”的认知图景。传统“华夷之辨”的文化秩序崩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危亡和文化危机唤醒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集体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跳出传统“循环史观”，反思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等观念对国家发展的阻碍。面对强势西方文化的外部冲击，

中华民族意识到自身文化的艰难境遇,从而产生了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自觉意识。换言之,文化主体形成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旨在防止文化被同化、消解和边缘化。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其实质是创伤记忆倒逼下的文化主体性的应激反应,在深层意义上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守护和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防御性觉醒。

另一方面,创伤记忆推动文化主体通过"他者镜像"进行文明自我确证,进而完成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性觉醒。从魏源"师夷长技"的器物模仿,到戊戌变法的制度变革,再到严复翻译《天演论》使"适者生存"成为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尺度,近代中国逐渐进入"历史意识觉醒"的时代,这一探索暗含着以他者为镜鉴的自省逻辑。进一步来说,创伤记忆推动文化主体直面"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有何价值"等核心问题,在古今中西的坐标系中对其重新定位。因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冲击-回应"框架外开辟新道路:新文化运动作为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批判,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辩证否定将创伤记忆转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要素,并使其内化于民族心理。至此,创伤记忆在文明碰撞中完成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建构的转变。

3. 交往记忆:集体实践与文化主体性的代际传承

交往记忆作为代际间在社会交互中共同拥有的回忆,承载着群体内部的互动交流,是维系代际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交往记忆顾名思义是借助交流完成的,它的范围一般限于比较小的群体内,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交往记忆涉及日常生活中个体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作用促成的记忆。"[4]370 换言之,单独的个体记忆往往是碎片化的,难以完整全面地反映历史,而代际间的互动意味着个体能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进行记忆储存,将其转化为群体共享的交往记忆,并形成共同认知。个人在与他人的记忆碰撞中完成"自我记忆的集体化",最终使交往记忆成为维系群体身份认同的纽带。

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正是在世代间的互动与传递过程中不断确认和塑造的。这一过程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代际传承中的对话和互动,构成文化主体性的实践形态。文化的认同并非由单一的个体或事件所决定,而是通过群体的互动和共享的历史记忆来建构,可以说,每一次代际互动都是对文化主体性的再确认。中华民族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正是在这种层层递进的代际交往记忆的交织与传递中,实现了跨时代的延续。

进一步而言,交往记忆的传递并非简单的复制和再现,而是具有短暂性与易逝性。这一特性使交往记忆随着记忆持有者的更替发生变化,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始终伴随再创造与再诠释的演化。而交往记忆的这一变动具有历史必然性,使文化内涵得以摆脱僵化的传统束缚,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语境,从而成为文化主体性保持活力的重要表现。然而,交往记忆不可避免地面临遗忘的风险,遗忘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淡忘,更是社会结构和认知的更替。社会记忆的遗忘往往意味着意义框架的消解,也提出了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重建的课题。若交往记忆未能在代际间有效传承,文化主体性可能遭遇衰退,甚至导致代际之间的文化理解和身份认同产生断裂。在现代社会,青年个体若失去与集体记忆的联结,则意味着其将缺乏与代际交往记忆的深度互动,可能导致青年一代疏离民族文化,进而破坏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历史延续性。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固守传统的交往记忆呈现出拒绝在代际传递中吸收新内涵而陷入封闭与排他的倾向,导致文化主体性因僵化而难以适应社会变迁。

二、认同转化:三重维度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230 这一论述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自信的根基这一要义。其核心不仅在于个人或群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坚守,"是个人通过文化将自己与

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体的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源泉。”[13]从更深层次看,文化主体性并非单一的文化认同,而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三者交织的产物。其中,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民族认同强调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政治认同侧重对国家主权、领土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三者相互关联并共同塑造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完整形态。在集体记忆理论中,集体记忆的首要特征就是“身份固化”或“群体关系”,即通过系统性的知识储存,使群体能够从集体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最终形成“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身份认同意识”[4]33。由此可见,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关键在于通过集体记忆的有效传递,回答“我们是谁”的身份确证问题,使个体在集体记忆叙事中完成从自我认知到集体认知的发展,从而凝聚并巩固稳定的中华文化主体性。

1. 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

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是指文化主体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符号体系的接受和认同,体现了文化意识的自我确认及文化主体性内核的稳定性。文化认同之所以作为重要议题受到关注,是伴随着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引发文化危机的过程而出现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加剧了文化认同的脆弱性,尤其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文化认同问题愈发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社会思潮的碰撞使中华民族的认同模式面临新的挑战,部分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怀疑,导致其民族精神价值体系受到冲击,从而威胁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稳定根基。实际上,这一认同危机正是文化记忆断裂与遗失的结果:当代际间的文化传承出现断层,核心文化符号的意义被消解,文化主体便会陷入身份迷茫的困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文化认同不再是单纯个人文化立场和选择的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凝聚的重大战略性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4]这表明,文化认同不仅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也是维系国家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此语境下,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耦合关系,三者构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身份认同支撑框架。

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不再局限于封闭的民族界限,而是逐渐呈现出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特征。在传统认知中,文化认同通常被理解为对某一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的认同,即文化认同的对象是自身民族文化。然而,这一视角忽视的是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未能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共享性和流动性。事实上,文化不仅仅是某一特定民族或群体的专有财产,而是共享的、习得的,跨文化的互动和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常态。换言之,文化认同并非仅仅局限于对自己所属民族文化的认同,不同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与互动,彼此共享共同的文化元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15]

每一民族在自身历史进程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步构建出一套符合民族发展、反映民族精神的文化体系,但这一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互动。文化的共享性体现在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借鉴、融合,并形成跨文化的认同和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同时还带来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商品本身负载着各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加上强势文化其他形式的‘文化输出’战略,使得弱势文化在强大的文化市场中丧失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偏好和坚守”[16]。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不仅依托于强大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积淀,更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文化自信自强。只有主动参与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在坚守自身内核的同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才能避免被强势文化所侵蚀甚至同化,真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2. 民族认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

“民族认同是文化主体性的确证来源”[17],是指文化主体基于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历史等因素而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体现着族群性共同体意识。这一认同的形成离不开深厚的集体记忆,即凝聚着民族的历史经验、文化象征和精神纽带的记忆,通过代际传承维系民族的历史意识和文化延续,成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因。进入世界文明史以来,全球化推动着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的形成,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西方与非西方的差异。全球化浪潮下的文明碰撞,使得民族认同不仅成为抵御“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精神防线,更构成中华文化主体性抵御同质化危机、维系精神独立性的重要保障。

中华民族作为历经千年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共同体,与之相伴的民族认同拥有深厚的历史纵深。“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8]换言之,中华民族的“自觉性”是民族认同在近代传统中形成的基本特点,在历史关键时刻成为凝聚整个民族力量的核心价值。陈来认为:“20 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是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19]。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绝非对文化多样性的否定,而是建立在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包容性认同:既承认并尊重不同民族在文化和历史上的独特性,又强调各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共同命运和文化根基。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单一文化或单一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要将民族认同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区别,后者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充斥着民族偏见和排外思潮,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核相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正在于此,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排斥“他者”,而是以多元一体的包容性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最终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的文明自觉。

3. 政治认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保障

政治认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保障,是指“以政治认知为基础,以政治感知为体验,通过一定的政治意志,借以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价值体系的承认、认可和赞同”[20],体现着政治文化层面的共同体意识。政治认同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深厚的制度基础和历史依托,确保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230 这一论述表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仅是文化认同的延续,更需要在特定政治框架下,通过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国家认同的强化,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制度性保障。

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个体或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身份确认,表现为主动、自觉地将自身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统一,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整体国家利益的主体意识。这一认同对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言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国家积弱则导致文化迷茫与民族危机,在此情况下,文化往往陷入自我怀疑,民族自信心容易受到削弱,文化身份的认同也会出现动摇。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表明,中华文化并未被全球化进程中的“同质化”趋势所吞噬而失去其主体性,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从而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提供了政治保障,进而担负起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三、实践路径: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记忆策略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传承和文化复兴进程的核心命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在集体记忆的认知建构过程中不断彰显文化主体性的活态体系,这一过程不仅

仅包含对过往文化的创造性继承,更指向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生命体的再造与升华,即“第二个结合”所推动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造就与新的时代条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既是文化自我更新的过程,更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挑战中实现自我认同与超越的重要路径。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在文化实践中正以自觉意识和自主立场形成基于中国视角的中国观和世界观,并以此为导向积极参与全球文化和世界秩序的重塑。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复兴逐渐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核心要义,在此背景下,建立有效的记忆策略,需以坚守文化领导主体筑牢政治根基为根本保障,通过系统梳理文化符号激活基因密码,以重构文明叙事体系贯通历史脉络,将集体记忆的再生产转化为文化主体性的内生动力,实现从传统赓续到文明更新的范式突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兼具历史深度与时代张力的中国方案。

1. 坚守文化领导主体,筑牢记忆根基

坚守文化领导主体,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不仅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保障,更是文明赓续的历史自觉。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作为中华文化保持独立性、增强影响力、走向世界的根本保障,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相融合的过程,推动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特有的主体性。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既要剥离其旧秩序、旧统治、旧阶级的文化‘党性’,又要与时俱进地塑造新时代人类文明的一般党性。”[21]这一论断点明了,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明确现代化的性质与领导力量。进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22],这一定位从根本上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即剥离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旧文化、旧秩序和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以“第二个结合”为引领,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中华文明特质深度融合,构建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具有全球引领意义的中华文化主体性。

更为关键的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体现在对集体记忆的梳理、阐释、激活与传承之中。集体记忆不是自然保存的客观历史,而是在社会框架中被不断选择与阐释。换言之,掌握记忆的阐释权,对集体记忆的阐释具有重要的身份塑造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领导主体,能够主动、自觉地对集体记忆进行科学梳理和正确阐释,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记忆、建设记忆、改革开放记忆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转化为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基质,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破解西方文明冲突论的话语霸权。中国共产党以这种历史自觉,在“旧邦新命”的文明转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的创造性结合。这一规律性认识,不仅筑牢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更在文明存续的维度上回答了“何以中国”“何以现代”的历史之问。

2. 梳理文明标识符号,激活记忆基因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以中华文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战略抉择,即通过提炼、梳理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标识符号,激活沉淀在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基因,让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可感知、可传播、可认同。莱布尼茨曾称中国为“人类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23],并认为中国拥有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发明。这一评价基于他对西方文化局限的深刻体认,为现代性反思提供了前瞻性启示。在他看来,欧洲文化的优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与伦理秩序建构上存在明显短板;而中华文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其仁政理念、道德教化可补西方之弊。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发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性反思,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认同。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因其独特性与深厚的历史积淀而具备超越民族界限、走向世界的潜能。具体而言,启蒙运动后资本主义陷入工具理性霸权,而中华文明以“道器合一”等智慧,始终维系着精神秩序与物质实践的辩证统一。

构建具有融通中外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关键在于将散落的文化基因梳理整合为可与世界对话的文明符号,既避免文化符号被误读,更

能在“各美其美”中为人类文明存续提供中国方案。纵观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标识符号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特征:文化形态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共同构成文明演进的历史连续体;文化表现维度,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相互支撑,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整体形象;文明特质维度,“旧邦新命”的历史自觉维系文明连续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新意识彰显文明创新性、“多元一体”的政治实践巩固文明统一性、“和而不同”的交往伦理诠释文明包容性、“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彰显文明和平性。这些特质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内涵,更是激活记忆基因、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

3. 重构文明叙事体系,贯通记忆脉络

近代以后,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崛起与对外扩张,部分西方学者断言中华文明处于停滞状态,无法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相提并论。然而,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其无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展和动态创新的事实,深层后果在于中华文明的集体记忆被切割为应该遗忘的传统和尚未开启的现代,导致古今之间失去有机贯通的可能。实际上,中华文明从未陷入停滞,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自我革新、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时空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正在于打破“传统即落后”的认知迷障,通过重构历史叙事体系揭示中华文明的演进逻辑,澄清和回应西方批评的误区,强化中国文明的独立性与价值。这种重构绝非对西方叙事的简单反驳,而是以集体记忆的创造性激活贯通文明脉络。

应当指出,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偏颇认知,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体系对文明多样性的压制。黑格尔曾形容中国是“永无变动的单一”[24],进而以绝对精神的线性进化论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演进主体性。在黑格尔理论体系中,历史被预设为绝对精神从东方(所谓初始阶段)向西方(所谓终极形态)的单向演进,非西方文明被强行赋予未发展的、静态的标签,其自身的演进逻辑与主体性被完全消解。实际上,中华文明始终以天人合一为宇宙观、以伦理秩序为社会根基,其发展围绕如何在变动中维系文明根脉展开,而非遵循西方对抗性变革的发展路径。时至今日,黑格尔式的历史偏见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依然存在,仍深刻影响着世界对中国及其历史的认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构文明叙事体系更需同步创新话语传播体系,既要打破西方话语的局限,提出符合中华文化特色的全球传播策略,更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中华文化的认同度与影响力,让世界真正理解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的核心价值。

四、结　语

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态不变的文化属性,而是在历史记忆延续、身份认同生成与文化实践更新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巩固的主体性力量。集体记忆通过对共同历史经验的保存、唤醒与再阐释,为文化主体性提供历史根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则在集体记忆的意义建构中逐步贯通,实现从“记得什么”到“认同什么”、再到“成为谁”的主体性生成。由此,中华文化主体性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也不是对外来文化的被动回应,而是在历史延续与时代变迁的统一中形成的文化自觉和主体能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不仅在于保存既有文化记忆,更在于使集体记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生成新的意义。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需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夯实集体记忆的政治与思想基础;系统梳理中华文明标识,激活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重构文明叙事体系,贯通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文化脉络,并通过“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造就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只有使记忆传承与时代创造、文化认同与主体实践相互贯通,才能使中华文化主体性由历史积淀转化为现实力量,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以更加开放而自主的姿态参与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提供深厚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

[2] 向玉乔. 深刻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N]. 人民日报,2024-05-22(09).

[3] 邹广文.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25(2):4-20.

[4]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费孝通. 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43.

[6] 冯文坤. 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例[J]. 学术界,2017(9):55-64.

[7] 吴玉军. 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革命英雄记忆书写[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6-30(10).

[8]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68.

[9] 孙羽津.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N]. 学习时报,2023-03-20(04).

[10] 马丁·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 张莉,刘曲,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61.

[11] 李昕. 创伤记忆与社会认同: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公共建构[J]. 江海学刊,2017(5):157-163.

[12] 赵月,邹广文. 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世界历史意涵[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5(3):45-52.

[13] 张志强. 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理论突破与价值意蕴[N]. 人民日报,2025-03-07(13).

[14] 习近平.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65.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7.

[16] 任洁. 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危机及出路[J]. 理论学刊,2011(8):105-109.

[17] 宋春霞. “民族-文化”共生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互构关系[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4):29-36.

[18]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17.

[19] 陈来. 梁启超论中华民族[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5):48-56.

[20] 詹小美,王仕民.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J]. 中国社会科学,2013(9):27-39.

[21] 刘须宽. 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内涵、面临挑战及其新时代建构路径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1):61-72.

[22] 黄明理,洪一明.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维意蕴与时态考辨[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4):1-10.

[23] 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M]. 梅谦立,杨保筠,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4.

[24]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15.

Memory, Identity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Consolidation Paths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 Zhao Yue(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changes on a scale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have become crucial to overcoming the dilemmas of modernity and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o we are." They are also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fostering cultural streng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rooted in the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preservation, and awaken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as well as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Glorious memories, grounded in the material, spiritu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ffirm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raumatic memories, arising from national crises and encounters between civilizations, stimulat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propel the cultural subject from defensive awakening toward proactive construction. Communicative memories facilitate the dynamic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thereby providing cultural resilience for consolida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On the basis of the meaning-making proces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dividuals and groups further undergo a transition from cultur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to political identity, forming an identity structure jointly underpinned by a sense of cultural belon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This process marks an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memory to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from identity recognition to subject 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consolidating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requires uphol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leadership over cultural affai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systematizing the symbol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ctivating the cultural memory embedded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narrative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connects tradition with modernity and China with the world. By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structures, Chinese culture can achieve a qualitative leap from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form of cultural life, thereby provi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fostering cultural strength, shouldering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and advanc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 the Second Integration